

公元七至十二世紀的四川密教遺迹

丁明夷
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引言

密教是佛教發展史上最後一個教派，大約形成於公元七世紀。密教是佛教中相對顯教而言的教派，屬於大乘佛教系統。密教著重修習和儀軌，並按照一定的儀軌而建壇、設供。它強調突出身結契印(手)，口誦真言(咒)，意念觀想(意)，以求得自己的身、口、意三業，轉成所修本尊的身、口、意三密，即可得到某種智慧和神通，乃至即身成佛。修密還可獲得息災、增福、鈎召、降伏等等不可思議的神密力量。從建壇設供開始，都需要本師的口授指點，秘密傳授。所有這一切，都與顯教的學習方法不同，故稱密教。

古代印度的密教歷史，大體可概括為三個階段，即古密教時期(又稱雜密)、瑜伽密教時期(又稱純密)和無上瑜伽時期(又稱左道密)。其中，戒日王和波羅王朝都曾推動了印度密教的勃興，而那爛陀寺附近的飛行寺和超戒寺，先後蔚成密教發展的中心。

在中國，雜密東傳，淵源久遠，雜密經咒東漢魏晉已有傳譯，迨至東晉，《孔雀王咒經》帛屍梨密多譯於建康，鳩摩羅什翻於長安，二人皆為西域龜茲名僧。此後，諸神咒、陀羅尼的漢譯不絕于南北。梁時譯出的《牟梨曼陀羅咒經》已有作壇法及畫像法的記述。北周時，闍那耶

舍共二弟子耶舍崛多、闍那崛多譯出《佛頂咒經並功法》一卷，後二人又譯《十一面觀世音經咒並功法》一卷，是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十一面觀世音神咒》傳入之始。

七世紀以來，印度密教興起，顯教漸衰。隋至唐貞觀年間，東來的著名僧人闍那崛多、達摩笈多等均譯有密典。初唐雜密，盛于高宗、武後、中宗時，永徽三年(652年)阿地瞿多應大乘琮公、李世、尉遲敬德等僧俗所請，於長安慧日寺浮圖院建陀羅尼普集會壇，有十二人入壇行事。阿地瞿多從《金剛大道場經》中撮要譯出《陀羅尼集經》十二卷。經中有“三重院方形壇”、“五重院方形壇”等記述，分別配合九十五尊法及二百零九尊法。此時，密籍漢譯日趨風行，不僅西僧翻譯，東土高僧如玄奘、義淨等也置身於密籍的轉梵為漢之中。其中有玄奘重譯的《十一面神咒心經》、義淨重譯的《不空絹索咒心經》等。

正純密教傳入中國的最早信徒，有可能是長安總持寺僧智通。智通姓趙氏，本陝州安邑人。唐貞觀中，北天竺僧齋到《千臂千眼經》梵本，太守令智通與梵僧對譯成二卷。《宋高宗僧傳。智通傳》記其“又雲行瑜伽秘密教，大有感通，後不知所終。”

完整系統的密教東傳，由開元初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開元三大士”的相繼入唐，大弘密教。善無畏(637-735年)為中天竺僧，後入那爛陀寺投達摩掬多為師，學受總持瑜伽密教。開元四年(716年)齋經本來達長安，譯經六部十八卷，其中最重要的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大日經》)七卷，成為密教胎藏界的本經。金剛智(669-741年)亦中天竺僧人，開元七年(719年)入唐，共譯經十四卷，《金剛頂瑜伽

中略出念誦法》(《金剛頂經》)成爲密教金剛界的本經。不空(705-774年)于金剛智卒後，奉旨復往印度“重學秘密總持，三密護身、五部契印、曼荼羅法三十七尊。”回國後，上皇(唐玄宗)“詔入內立灌頂道場，所齋梵經盡許翻度”，凡一百二十餘卷、七十七部，最重要的是《金剛頂經》三卷。不空還別出大量念誦儀軌，其中的尊形與壇場部分、對東土密教修持與傳播起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不空於天寶年間應河西節度使哥舒翰之奏請、至武威開元寺“請譯佛經，兼開灌頂，演瑜伽教，置曼荼羅，”後又去安西(龜茲)弘密。不空長期在西陲弘密，極大地推動了河西、西域一帶密教的繁盛。

從善無畏不空，系統地漢譯密教經典，並完備唐密圖像，佛教密典至此充斥中土，唐密圖像也日趨完備，中國佛教密宗至此成立。迨至中晚唐，唐長安形成唐密三大根本道場——弘法道場青龍寺，護法道場大興善寺和舍利供養道場法門寺，中國唐密不僅傳承相繼，而且傳入日本，形成了日本的“東密”和“台密”。

漢譯密籍既盛，與之相應的密教形像也開始流行，國內現存可以肯定的密教遺迹，多爲武周時期產物。其中，山東駝山第1窟本尊爲大日如來佛，窟內有長安三年(702年)造佛龕，知爲初唐遺迹。龍門東山擂鼓台北洞、萬佛溝和西山惠簡洞附近，現存五處密教窟龕，包括兩處大日如來窟，兩處千手千眼觀音龕和一處十一面多臂觀音像，擂鼓台北洞的大日如來像脅侍八臂觀音和十一面四臂觀音各一尊。其中，東山劉天洞大日如來像雕於天授三年(692年)以前，東山高平郡王窟下方千臂觀音像雕於天授元年(690-705年)之間。原藏西安寶慶寺的十一面觀音立像，有長安三年(703年)銘記。敦煌莫高窟現存明確的最早的密教形像，也出

現于武周時期，如 321、331、334、340窟前壁的十一面觀音立像壁畫和 341窟的八臂觀音立像壁畫。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武周時期的密教形像中，龍門的千手千眼觀音龕和大日如來窟，都是較完備的密教的窟龕。而上述莫高窟則僅是在窟前壁布置密教形像，而以觀音變相作為釋迦衛護而出現，沒有密教主佛造像。觀音變相的密教形像出現於此時，似乎與東土高僧積極的密典傳譯有關。如玄奘於顯慶元年(656年)重譯的《十一面神咒心經》、義淨於長壽二年(693年)重譯的《不空絹索咒心經》、景龍三年(709年)重譯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如意輪陀羅尼經》等，都曾見重於當時。而大日如來形像，則似乎與永徽四、五年(653、654年)所譯，後又奏清流通天下的《陀羅尼集經》有關。

四川現存公元七至十二世紀的密教遺迹，以石窟雕刻為主，其傳布的時間，自初唐迄于南宋，跨越凡五個世紀。就其內容而言，廣元石窟的初唐密教造像，已具有相當完備的儀軌和粉本流傳，並逐步形成定制，代表了四川初唐密教造像的成熟風格樣式。盛唐時期廣元、巴中的密教造像，已形成系統完備的密教圖像體系。晚唐五代之際，特別是“安史之亂”後，隨著中國石窟重心的南移和唐代皇帝的兩度入蜀，豐富多變的密教遺迹是四川石窟崛現於蜀中各地的重要契機。迨至兩宋，長盛不衰的四川密教體系，完成了自唐密至川密的重要轉變，形成為極富特色的文化寶藏。

對四川密教遺址的調查與研究工作，過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個中原因至少有三端。其一，按照傳統的“中國三大石窟”(雲岡、龍門、敦煌)說和佛教史上“北方重實踐，南方重義理”的理論，學人多將目光放在北方

石窟的研究上，對南方石窟所知甚少。而“三大石窟”說亦是外國學者率先提出的。以四川石窟為例，二十世紀一十年代，法國學者色伽蘭曾調查廣元、巴中石窟及綿陽平陽關上南梁大通三年(529年)補鑿佛像等。大足縣知縣陳習剛調查大足石刻，撰有《大足石刻紀略》一書。成都萬佛橋附近的萬佛寺遺址，自1945年開始至80年代，陸續出土宋元嘉二年(425年)及齊、梁等紀年的南朝造像。除此之外，建國前對四川造像的介紹可以說是乏善可陳。建國後若幹年內，對四川石窟基本上處於文物普察階段。八十年代以後，對四川石窟的調查與研究逐步走上正軌，盡管在專題研究、分期排年與考古報告諸方面尚有不少空白，但仍是令人欣喜的。其二，四川石窟藝術雕刻精美，內容豐富，數量巨大，堪稱全國各省石窟之冠。據初步統計，四川石窟(摩崖造像)總數約一千處。全省將近五十個市縣有比較集中的石窟崖造像，窟龕在十個以上的分布地點有一百二十多處。其中，安嶽縣現存100餘處，大足縣現存60餘處，巴中市現存58處。四川石窟始鑿於北魏，與北方石窟近乎同步。南朝造像在國內亦稱獨步。盛唐以後，正當北方中原地區石窟如日落中天，漸顯頹勢之際，四川石窟卻以異軍突起之勢，崛起於蜀中各地，歷經中晚唐、五代和兩宋，四百年間昌盛不衰(圖24.3)。而且這些石窟獨具特點，異彩紛呈，不僅有彌足珍貴的密宗造像，還有隋唐時期的佛、道像並作，兩宋時期的三教合一造像問世。還有唐宋雕刻的佛經，宋代的水陸造像。這些均為國內翹楚，極富特色。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四川石窟是一座蘊藏豐饒，尚待開發的藝術寶庫。正因為如此，對四川石窟的調查研究，須假以時日，進行大量的工作，方能獲得初步的了解。筆者自八十年代始涉足四川石窟至今，亦僅考

察石窟近 50 處，可說是十不足一，難窺得全豹。國內著名的石窟學者，如恩師宿白，學兄馬世長，同樣對四川石窟無暇顧及，原因或許與此有關。其三，過去治中國佛教史，特別是密宗史者，有一種傳統的見解，認為中國密宗自晚唐以後，疊經安史喪亂，大法東傳扶桑，國內流傳失緒，遂至斷絕。因此，一部中國佛教通史，晚唐以後的密宗部分基本上是一段空白。這種情形，迨至八十年代中期後，才有改觀。1987 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塔地宮中出土的鹹通年間密宗圖像，增添了晚唐密宗活動的新資料，也掀起了對中國唐密原貌的新詮釋。1988 年，筆者在《文物》期上刊載《四川石窟雜識》一文，初步介紹四川石窟中的密宗資料。1989 年，富白先生在《文物》9、10 期上連載的《敦煌莫高窟教遺迹劄記》，較系統地介紹了莫高窟自唐迄元的密教遺址，開拓了人們的視野。自此，國人對國內石窟中密教遺迹的注意，再不僅囿於龍門石窟唐代部分。有感於此，筆者將歷年調查所得，按時代序列，介紹四川石窟密教遺迹於後。

四川初唐密教遺迹

自古以來，黃河流域一直是中國政治經濟活動的中心。佛教傳入中國後，歷代高僧多活躍於黃河流域。四川由于路險道阻，往來中國的高僧入蜀者蓋少。因此，佛法何時傳入四川盆地，至今仍無定論。至遲在東晉十六國時期，關於入川僧人的記載漸漸多了起來。其中如三賢寺僧生、石寶山法緒、廣興閭興寺賢護等高僧，多來自河西（涼州、高昌、西域），以禪定誦經為業，傳入的地點集中在成都附近。在四川早期佛教傳播史上，東晉名僧法和是

一個重要人物。他與名僧道安同學，均出佛圖澄門下。慧皎《高僧傳》卷5記：“釋法和，滎陽人也。少與道安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綱，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群。聞襄陽陷落，自蜀入關住陽平寺。”法和亦與僧朗同學，法和開教四川，僧朗布教山東，法和與道安曾親赴僧朗在山東泰山金輿穀的大法會。僧朗、道安皆與建寺造像有關。由此可以想見，當年法和入蜀，也很可能參與佛教寺、像的拓基之舉。四川早期佛教與北方(尤長安)、河西的關係較為密切。此時，道安的兩大弟子曇翼和慧持也先後入川。慧持是高僧慧遠的胞弟，曾參與《中阿含經》60卷譯事，聞知益州地沃民豐，志往弘化，兼欲觀峨眉，乃於399年自建康溯江西行，經江陵西達成都，止龍淵精舍，大宏佛法。

古代中原北方通往四川的孔道，即所謂秦蜀走廊，主要有兩條：一為由長安經漢中(褒斜道)至廣元、綿陽、成都一線的金牛道；一是漢中至巴中、通江，西達川東一線的米倉道。70多年前，法國學者色伽蘭(《中國考古調查團圖錄》)調查四川漢代崖墓，漢闕和廣元、巴中石窟時，曾發現綿陽東北4公裏的陽平闕上，有南梁大通三年(529年)補鑿的佛像，並據此推斷，古代還有一條從建康到四川，聯系南朝與高昌、柔然的通道，即由建康沿水路至四川，再由四川至青海、高昌(吐魯番)。這條路線，是上述慧持自建康至成都之所行，亦由解放前茂縣出土齊永明元年(483年)“無量壽、當來彌勒二世佛像”所初步證實。該像為國內著南朝褒衣博帶式佛裝的最早實例，茂縣(今茂汶羌族自治縣)又當南朝聯系高昌的必經之路，川西北造像之重要性正在這裏。

南北朝時期，四川是南朝與北朝勢力沖突的地域，四

川佛教由此獲得蓬勃發展的契機，佛教造像也漸次普及。四川現知早期造像，如成都萬佛寺出土宋元嘉二年(425年)淨土變石刻及齊、梁間造像，茂縣出土齊永明造像，廣元一批北朝石窟及該地出土北魏延昌三年(513年)造像及北周劉約造像等，均為有說服力的實證。四川的北朝造像大體保持與中原北方的同步水平。而其南朝造像就其數量、類型而言，在國內堪稱獨步。

唐王朝大一統局面的出現，使石窟造像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更多窟龕造像出現於川北、川中的崖壁上。廣元、巴中、通江、綿陽、安嶽、大足等地，相繼造出初、盛唐時期造像。其中以廣元的初唐密教造像格外引人注目。

有唐一代，君王、名宦、文人學士，或外放，或流徙，或避難，往來經過巴中、廣元二地，可說是京華冠蓋，不絕于路。他們大多直接或間接參與開窟造像。例如，武則天父武士彟，武德中任利州(今廣元)都督，七年(624年)夫人楊氏生武則天，貞觀四年(630年)離任。郭沫若先生曾考證武則天生於利州，廣元皇澤寺即因此得名。皇澤寺第13窟寶曆二年(826年)《西龕佛國記》中載，聖唐武德二載(628年)楊氏曾於皇澤寺雕鑿佛像。廣元千佛崖，皇澤寺之初唐造像(如皇澤寺大佛窟)，很可能與此有關。

唐睿宗景雲、延和年間(710-712年)，利州利史畢重華，於千佛崖鑿菩提瑞像窟。此窟五代前蜀乾德六年(924年)的妝修碑記稱為“毗盧遮那佛”即大日如來。可知廣元初唐密教造像亦多與武周關涉。

有關密教傳入四川的資料極其有限，《宋高僧傳》卷35《唐梓州(今四川三台縣)慧義寺清虛傳》記：“長安二年(702年)，(清虛)獨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

泉……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四年，入少林寺夏坐，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雲鬼神居宅焉。(虛)即往彼，如常誦經，夜間堂東有聲甚厲，即念《十一面觀音咒》。自此居者無患……神龍二年(706年)，准詔入內祈雨。”清虛的事迹，反映出武周長安年間四川地區已有密教流傳，四川密教的流行多與兩京地區聯系密切。

在文獻載籍中，“開元三大士”寓足長安，結壇灌頂，譯解密籍之前，兩京地區流行的密教以隋唐之際傳入的印土雜密為主。高宗、武周、中宗三代、雜密圖像施繪於兩京寺院，尤以武周時期為盛。此時的敦煌莫高窟密教造像內容和形式均較簡單，沒有密教主佛造像。龍門石窟、駝山石窟中的大日如來像，從時間上看可能是受長安密教的影響，這一點同廣元造像類似。

京都長安是初唐全國的密教中心，對長安密教產生很大影響的僧人是從中天竺來華的阿地瞿多。永徽二年(651年)，他經由西域到達長安，五年(654年)譯出《佛頂陀羅尼集經》。此經譯出後，反響強烈。此前，阿地瞿多更於三年應大乘琮、英公、鄂公等之請，在長安慧日寺建陀羅尼普集會壇。阿地瞿多所建曼荼羅壇場中，應有較多的密教形象，這與廣元流傳或保存下來的密教形像正可互相映證。慧日壇場的建立影響很大，驚動了長安的衆多僧俗，京中顯貴如英公李、鄂公、尉遲公等亦極力參與其事。阿地瞿多緣此頻進入宮廷，其所譯《陀羅尼集經》又“奏清流通天下普聞”，密教影響日益擴大，密教曼荼羅也開始流行。自阿地瞿多以後，長安密教經典的翻譯更為風行，玄奘等譯經大師也相繼加入這一行列。下面，試以廣元初唐密教遺跡來加以說明：

1、千佛崖蓮花洞右壁毗盧遮那佛像

蓮花洞們位於千佛崖最下層，前臨嘉陵江。窟橫長方形，正壁及左、右壁環壇鑿佛像，圓拱龕內雕一佛二菩薩三尊像。該窟三鋪龕像風格統一，明顯是統一布局一次完成的。

正壁大龕主尊為倚坐彌勒佛像，右壁大龕主像為結跏趺坐像。值得注意的是右壁主龕坐像。高1.92米，為結跏趺坐，著袒右肩大衣，螺髻，髻前部嵌一長圓形玉壁。頸飾繁麗七寶項圈，右腕戴鐲，雙手作降魔印。

有關密教教主的描述，最早應以《陀羅尼集經》校為明確。該經卷記“佛頂像”(即密教教主像)儀軌時說：“其作像法，於七寶華上結趺坐，其華座底戴二獅子……其佛右手者，伸臂仰掌當右膝上，指頭垂下到於華上；其左手者，屬臂仰掌向臍下橫著。其佛左右兩手臂上，各著三個七寶瓔珞。其佛頸亦著七寶瓔珞。其佛頭頂上作七寶天冠。”蓮花洞右壁龕像主佛，髻前雕出摩尼珠頂嚴，雙手作降魔印，手飾七寶項圈與手鐲，其像式與上述密教主佛儀軌多有相同之處，可見其雖然不是嚴格依照儀軌雕造的，但無疑是密教主尊毗盧遮那佛。與蓮花洞右壁龕像表現類似的初唐密教主尊造像，還有龍門東山大日如來小窟及山東駝山第1窟本尊。

2、菩提瑞像窟主尊

位於距地面10米較高崖面，為敞口方形平面窟。窟中央鑿一大方壇，上設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七尊像，壇正面雕二供養菩薩。窟正壁及左、右壁基部設環壇，高浮雕弟子12身和伎樂5身。立佛身後鑿直抵窟頂的鏤空大背屏，主佛著袒右肩袈裟，頭戴高寶冠，頸飾七道垂珠瓔珞，佩臂釧和手鐲，雙手施降魔印，結跏趺坐於束腰方座

上。佛背倚摩竭魚首靠椅，椅背兩側各浮雕一童子騎怪獸像，背屏近窟頂處雕菩提樹葉、雷神兩神和二飛天。

上述像式，正與密典中所戴毗盧像儀軌大致相合，而這種壇上設像，像背雕菩提雙樹的布局，與《陀羅集經》卷《畫一切佛唄像法》中關於“其像背面畫雙樹形”等記載吻合，顯示了從中心柱窟向中心方壇的過渡形式。

菩提瑞像窟的主尊，五代前蜀乾德六年(924年)妝修記稱為“毗盧遮那像。”此窟的開窟年代，根據對《大唐利州畢公柏堂寺菩提瑞像頌》碑的考證，知為唐睿宗時期(710-712年)，即在密宗三大士來華之前。

該窟主尊繼承了蓮花洞右壁毗盧造像的一些特殊手法，表現了其間的延續關係。但該主尊像周圍的多種輔助形像以及中心佛壇，像背雕雙樹等特征，則是唐代前期其它毗盧像(即大日如來)所沒有的，洛陽龍門地區的大日如來，多是單體造像或簡單一佛二菩薩三尊像形式。此窟的主體造像則為一鋪七尊，依據《陀羅尼集經》造出，是國內現存最完備的一鋪初唐密宗造像。

開鑿於睿宗朝的菩提瑞像窟，代表了四川初唐密教造像的較成熟風格樣式。這種初唐密教造像雖不似盛唐時系統籠大，但仍具有相當完備的儀軌和粉本流傳，並逐步形式定制。這種形式，可以認為是阿地瞿多“陀羅尼普集會壇”的實物佐證。它日趨完善的形像儀軌，定會對周邊信眾產生影響，流布民間，這就為盛唐之際全面接受系統完備的密籍圖像奠定了基礎。

我們說，川北石窟自初唐以來已出現較完備的密教形像，不僅因為造出了一批毗盧像，還在於與密教像相關連的一套密教義軌的廣泛採用。例如，

中心佛壇，壇上雙樹，樹間人形化天龍八部護法像以及降魔印，摩尼寶珠，生靈座等。按窟室中部設方壇，以敦煌莫高窟隋開皇五年（585年）開鑿的305窟為較早。而大體依據《陀羅尼集經》鑿出上設毗盧佛，像背雕雙樹的中心佛壇，則以廣元菩提瑞像窟為典型。千佛崖已鑿出一批佛壇窟，數目達七個。密教修法必築壇供物以奉祀本尊，修法有息災，調和，增益，敬愛，鉤召五種，前三種用於胎藏界中佛，金剛，蓮花三部，五種則用於金剛界五部（增加寶、羯磨二部），其中鉤召法，用於召請本尊的場合所修。不空譯《曼荼羅儀軌，第五院鉤召被甲法》中，記載了八部護法人形的形象，因而這種人形化的八部護法像，可能即依據密典造出。廣元皇澤寺大佛窟鑿于初唐，其雙樹間人性化天龍八部護法像，為國內現知最早的此類形象，這與密教在廣元的流行不無關係。降魔印為密教特有的手印，晚唐以後是智拳印。這時的降魔印，不僅用於毗盧佛，間或亦見於顯教造像，如廣元蓮花洞中釋迦佛。摩尼寶珠漢譯為如意寶珠，意為供養可隨心如意達到所求。密教像如如意輪觀音、地藏菩薩、藥師佛、馬頭觀音等，手中多持此珠，千手觀音四十手中，右一手持日精摩尼，左一手持月精摩尼。密教修法中，還有一種“寶珠立”法（舍利法），直指本尊為寶珠。《造像量度經》中記，南方佛主寶生佛，左手“標幟摩尼珠置左掌上”。巴中南龕盛唐毗盧佛，雙手施降魔印，左手亦置寶珠。一些造像如彌勒佛，亦作左手置膝握寶珠之勢。至於生靈座，指佛座上雕出獅子、象、馬、孔雀、金翅鳥等五種動物形象，亦為密教的特有。《造像量度經》中記為“論座位……有通別二者……別者，謂秘密五部主佛，各有宜用分別。如來部主毗盧佛，坐獅子王座，金剛部主阿耨佛，象王座。寶部主寶生部，馬王座。蓮花部主彌勒佛（圖#），孔雀王座；羯磨部主不空佛，鵬鳥王座”。廣元千佛崖牟尼閣窟與千佛窟，佛壇上主佛，分別作象首座與獅子座，雖不一定是阿耨佛及毗盧佛，但亦可見密教影響之一斑。“六具”同為密教像特有的裝飾，在廣元千佛崖已見端倪。菩提瑞像窟主尊毗盧佛靠背椅上，浮雕摩竭魚、雁及童子騎獸王。這種“六具”的形式，在巴中南龕等盛唐窟龕中，已發展了完備的樣式。

3. 毗盧與彌勒並尊，顯、密兼修

四川初唐密教遺址的另一顯著特點，是毗盧與彌勒並尊，顯、密兼修的現象。蓮花洞主尊為倚坐彌勒佛，左壁為釋迦佛，右壁為毗盧佛。菩提瑞像窟毗鄰的彌勒窟，為敞口方形平頂窟，窟中央鑿方壇，上設一彌勒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七尊像。彌勒窟據其位置，窟形，佈局及造像風格等特徵，與菩提瑞像窟應為同期鑿造的一對雙窟。窟中主尊，一為彌勒佛，一為毗盧遮那。這種組合，較之蓮花洞以彌勒為主，並祀毗盧遮那的情形，更具顯密雙修的特點。

毗盧與彌勒並尊的組合，在盛唐時期的巴中石窟日益明顯。巴中南龕46龕，鑿二佛二弟子二天王二力士一鋪十尊像，即為毗盧與彌勒與一窟中並尊。這種組合不見於國內其他地區，川北地區唐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佛教顯、密並重。這同樣反映出密教影響的日益擴大。通江魯班窟23窟皆為彌勒窟，主佛彌勒皆為頭戴寶冠，側立雙樹雕刻，身後方形靠背，側雕“六具”形象，均為密教圖像。當然，四川初唐流行彌勒佛，或許與武則天有關。武後崇佛，偽造《大雲經》，以彌勒自況，預言將登王位。一時間，彌勒造像風行天下。

四川盛唐密教遺迹

盛唐時期四川窟龕造像急劇增多，題材內容益趨擴大，密教造像亦呈上升態勢。這一時期較大較重要的鑿窟造像之舉，多與節制一方的地方官吏有關。玄宗開元二年，韋抗自太子左遮事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嗣年在廣元千佛崖“鑿石為路並鑿千佛功德”，具體位置是大雲洞和韋抗窟。開元六年(720年)上柱圓、許國公蘇，罷政事，除禮部尚書，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於是時鑿千佛崖蘇廷頁窟(圖24.1)。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化城縣尉黨守業鑿巴中南龕69窟。開元二十八(740年)化城縣主簿張令該鑿巴中南龕71窟。開元十年(722年)普州刺史韋忠于安嶽千佛塞造像。嚴武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

夫，後坐琯事，貶巴中刺史，乾元三年(706年)，嚴武向朝廷奏表，于巴中南龕廣建屋宇，鑿觀音立像，奏求光福寺名。

四川盛唐時期的密教遺迹，表列如下：

時代	內容
盛唐	毗盧遮那(巴中南龕 37窟、103窟，巴中龕 12窟，巴中西龕 40、46窟) 千手千眼觀世音(廣元千佛崖、廣元觀音崖) 四臂觀音(廣元皇澤寺) 如意輪觀世音(廣元千佛崖韋抗窟外壁，巴中南龕 16窟) 十一面觀世音(廣元千佛崖下層崖壁) 藥師琉璃光佛(安嶽千佛寒 40窟，天寶十載，745年) 藥師三尊(巴中北龕 14窟，巴中水寧寺 1窟，安嶽淨慧岩 3窟， 數珠手觀世音(安嶽淨慧岩 15窟，乾元年間，758-760年) 地藏十王像(通江千佛崖 29窟，廣元千佛崖千佛窟) 訶利帝母(巴中南龕 68、81窟)

川北地區盛唐時期毗盧佛保存較多，皆為戴高寶冠，偏袒右肩，身飾項圈、臂釧和手鐲，施降魔印。其中，巴中南龕 37窟，北龕 12窟，佛座靠背裝飾“六具”：西龕 40窟佛螺正中飾摩尼寶珠。按《造像量度經》中有：“此五佛頂嚴各作五股金剛，以具五部議，或作摩尼珠頂嚴亦得”，飾摩尼珠，為密宗主佛頂嚴之義。又該經記雲“背光制有雲衆六具者，一日伽僧，華雲大鵬，乃慈悲之相也。二日布羅，華言鯨魚，保護之相也。三日那羅雲龍子，救度之相也；四日布羅？華雲童男，福資之相也。五日舍羅，華雲獸王，自在之相也。六日救羅，華雲象王，善師之相也。是六件之尾語俱是字，故雲六具，以經合六度之義”。這是密教造像特有的裝具。唐代彌勒像及優填王像，亦有六具裝飾的靠背。

如意輪觀世音菩薩像，廣元及巴中各有一例(圖

24.2)。巴中南龕 16 窟，有唐鹹通年修裝記，審其像容，乃盛唐遺存。該像束發頂中有化佛，遊戲坐於仰蓮圓座上。凡六臂，左上臂舉金輪，中臂撚指如持花狀，下臂按座，右上臂作思惟狀，中臂上舉數珠下臂執寶珠於胸，兩側侍立二天王，左天王托塔，右天王杖劍。按寶思惟譯《觀世音菩薩如意摩尼輪陀羅尼念誦法》中記“其菩薩形像，造恩惟之形，有六臂，其左上作金輪之手，中手執蓮花，下手按山。右手作思惟狀，中手執如意珠，下手執如意珠……頂上有化佛。”與該像造型幾乎全同。六臂如意輪、觀世音菩薩，為密教六大菩薩之一（十一面、千手、如意輪、淮胝、馬頭和聖觀音）。其六臂，按密典所載，分別與六觀音相應。又與六道輪迴中的六道相合。

多臂觀音像，一為廣元皇澤寺四臂觀音，一為廣元觀音崖千手千眼觀音。觀音崖像已毀，題記作“造大悲觀世音菩薩一龕”。廣元千佛崖下層，有一龕十一面觀世音龕像。此三像皆為盛唐遺迹。

藥師琉璃光佛，頂有肉髻，著佛裝，多作一手持寶珠於胸前，一手執錫杖於肩後的形像。或單龕供養，或作藥師三尊（脅侍日光、月光菩薩或藥王、藥上菩薩），或與觀音地藏等形像合龕。巴中北龕 12 窟，雕藥師三尊像，龕下並刻十二藥叉大師。

地藏像。據《佛說地藏菩薩陀羅尼經》，密像地藏應作沙門形。玄奘譯《大乘大集地藏十王經》亦記，地藏入兩部密像。四川盛唐以來地藏多作沙門形：光頭，佛裝，持寶珠。按菩薩形，舒相坐式地藏，原為三階教造像。而沙門形密像地藏，大別有三種形式：立式，著雙領下垂衣，胸前或佩頸圈；舒相坐式；結跏趺坐式，披風帽，禪定印，掌心置珠。另一種特殊形式的地藏像，是地

藏十王。玄奘譯有《大乘大集地藏十王經》，晚唐時“成都府大聖慈寺沙門藏川述”作的《地藏十王經》為中土一種特殊的密教題材。晚唐時十王經應世而出，這種題材造像流行民間應更早。現存二例，皆為川北。二窟地藏像皆為舒相坐式，沙門形，雙手毫光雲端上各化現五王。地藏救度地獄衆生，於是，又出現地藏與六道輪迴相結合的圖像。國內較早二例，一是龍門賓陽北洞外龕，地藏毫光中化現天、人、畜生、地獄四道。一為彌勒像陰，中鑿舒相坐地藏，化現六道形像。巴中南龕25窟，約鑿于盛唐，地藏著雙領下垂衣，光頭，頂懸華蓋，右手施無畏印，左手反置寶珠。地藏上方祥雲上，刻劃六道形像；武士形，左盾右劍(天)；三頭六臂，手持秤，折尺與日、月(阿修羅)；女供養人(人)；一象(畜生)；雙髻交領廣袖人(餓鬼)；著犢鼻褲裸身人(地獄)。此為地獄與六道輪回相結合的典型形像。

訶利帝母像。凡二例見于巴中南龕68、81窟。二窟皆為外方內圓雙重龕形，內龕正中鑿訶利帝(鬼子母)像，頭盤髻，著交領窄袖衫，盤足坐，懷中抱一小兒，身側各四身小兒，合九子。

晚唐、五代的四川密教遺迹

此一時期的四川密教造像，數量和題材增迅速。現表列如下：

四川晚唐、五代密教造像一覽表

時代	內容
晚	毗盧佛(廣元千佛崖毗盧洞)

唐	<p>毗盧佛與十二圓覺菩薩(資中西岩 10窟)</p> <p>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安嶽臥佛院 46龕、庵堂寺 13窟，圓覺洞 42窟，資中北崖 11、113窟，西岩 4、45窟，大足北山 9、273窟)</p> <p>如意輪觀世音菩薩(大足北山 50窟，乾寧四年，897年)</p> <p>白衣觀音菩薩(安嶽庵堂寺 11窟，天成五年，930年)</p> <p>白衣觀音及花聚菩薩(安嶽庵堂寺 9窟，咸康元年 925年)</p> <p>解冤結菩薩(大足北山 209窟，安嶽圓覺洞 66窟)</p> <p>不空絹索觀世音菩薩(大足北山 215窟)</p> <p>十一面觀世音菩薩(資中月仙洞 10窟)</p> <p>毗沙門天王(通江趙橋岩，景福三年，892年，巴中南龕 65龕，乾符四年 877年。大足北山 3、5窟，景福三年，982年，資中北岩 46、58、49龕，鹹通六年，865年。資中西岩 34窟，天成 929年)</p> <p>藥師三尊(資中北岩 100龕，大中十二年 875年)</p> <p>藥師與十二藥叉(資中南岩 15窟)</p> <p>藥師變(安嶽千佛龕 96窟，大足北山 279、281窟，廣政十七、十八年，854、855年)地藏十王(資中西岩 89窟，光化年間，898-901年)</p> <p>地藏、十王與六道輪迴(安嶽圓覺洞 84窟)</p> <p>華嚴三聖(資中北岩 32、93窟，安嶽圓覺洞 49、630窟)</p> <p>不動明王(大足北山 47窟)</p> <p>大威德金輪熾盛光佛(大足北山 39窟，乾德四年 922年)</p> <p>陀羅尼經幢(大足北山 279、281窟)</p> <p>尊勝幢(安嶽臥佛院 51窟，廣政二十四年，961年)</p>
---	---

晚唐五代是四川密教造像的盛期究其原因，蓋有三端。

其一，唐玄宗、唐僖宗帶領唐貴族兩度入蜀避難，中原的文人、高僧、高道、名工伎巧等相隨來到四川，“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難在蜀”。西蜀統治者首設翰林圖畫院，羅致天下名士，“蜀中雖僻，而畫家獨多於四方。”四川不僅發展成爲文化繁盛之地，更爲石窟建設的重點地區。正是密教的繁興，促進了四川石窟的興旺。

其二，四川密教造像興盛於晚唐。此時，長安青龍寺成爲唐密傳教的根本道場，青龍惠果傳法訶陵、新羅、

日本等國，國內弟子也是“流派遍域”，其中包括“劍南惟上”。惟上受惠果親傳，受二部阿闍梨灌頂，又見於空海為惠果所撰《大唐神都青龍寺故三朝國師灌頂阿闍梨惠果和尚之碑》，自非等閑人物。劍南一作成都，惟上一作惟尚。惟上學成返川，在成都一帶弘傳密法，播下了正宗唐密流布四川的種子，四川自此密迹大興。以大慈寺為代表的四川晚唐佛教盛時，即為其突出的實例。

據《益州名畫錄》引宋李之純《大聖慈寺畫記》，一代名剎大聖慈寺“總九十六院，畫諸佛如來一千二百二十五，菩薩一萬四百八十八，帝釋梵天六十八，羅漢神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神將二百六十二，佛會、經變不與焉。”可說極一時之盛，規模超過長安大興善寺，法門寺等京師、京畿名剎。該寺晚唐有壁畫萬幅，宋時尚存屋宇八千五百間。《益州名畫錄》卷上記載，唐大中(849-859年)年間，該寺有大悲變相，左昱畫。“文殊閣東畔水月觀音，千手眼大悲變相”、“普賢閣裏如意輪菩薩，並(辛)澄之畫。”中和(881-884年)年間，大聖慈寺有張南本畫“華嚴閣東畔大悲變相，興善寺大悲菩薩、八大明王、孔雀王變相”。“興聖寺大悲變相，並鹹通(860-873年)畫”。《圖畫見聞志》卷六載：“唐僖宗幸蜀(881年)……張位扈從……于成都應天寺東門左壁畫坐天王及部從鬼神，筆鋒狠縱，形制詭異。”大聖慈寺中諸多密教題材繪塑，是代表了當時川西的情況。如西蜀畫院翰林待杜龜齡作毗盧佛、十一面觀音。翰林待詔杜龜齡敬安作北方天王等。上述密教內容均反映於同時期的四川石窟中。

其三，晚唐以後密宗在四川的傳布，確實是流傳有序，見於碑史和造像，這是中國佛教史和造像史的重要發現。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則是四川密教史上祖師式

的關鍵人物——晚唐、五代的柳本尊和南宋趙智鳳。他們活動的時間前後超越晚唐至南宋近四百年，活動的空間是自川西到川中，就在該時該地完成了自唐密向川密的重要轉換，出現了獨具特色的四川石窟造像的高峰。

板本尊(唐大中五年一天福七年，856-942年)，嘉州(今四川樂山市)人。據大足寶頂山佛灣釋祖覺重修《唐柳居士傳》記載：“蔬食布衣，律身清苦，專持大輪五部神咒，蓋瑜伽經中略出念誦儀也，誦數年而功成……以瑜伽經為五部，而以毗盧本尊，位居中央。其東方金剛部佛日阿，南方灌頂部佛為寶生，西方蓮花部……次剖二十八菩薩以理之，四方各開一門，有菩薩主之，是為三十七尊，而毗盧居中……金剛智，智傳不空，不空傳口、一行禪師，稱瑜伽。”大中寶頂大佛灣柳本尊行化道場崖頂刻“唐瑜伽部主總持王”，小佛灣經目塔正面刻“六代祖師傳密印”，均指柳本尊。這就表明柳所傳為金剛界五部密法，持誦金剛界重要經典四卷本《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法》，尊奉三十七尊金剛界曼荼羅。

柳本尊為晚唐、五代時期四川唐密金剛部的部主和祖師。四川所承的六代祖師，據稱指金剛智、不空、惠果、義操、義真、柳本尊。如此，則柳應為成都惟上一系的傳人。

柳為四川密教又一代阿闍梨，其傳記稱其行教特點為“蔬食布衣，律身清苦”，則具有顯著的時代和地方特色。柳本尊傳教以誦經念咒，自殘形骸、舍己為群為主，大足、安嶽等處的“十煉圖”為獨具一格的行化道場。柳于成都一帶布教，盛於廣漢、蒙，弟子雲集，影響深遠。後唐明宗曾“賜其本尊院額日大輪”。晚唐、五代時期密宗勢力在四川的迅速發展，與柳本尊有很大的關

系。

晚唐以後，益州與長安、瓜州間的往來日益頻繁。自唐武宗滅法後，經過大中複法，長安密教迅速恢復壯大。青龍惠果弟子惟上返川弘教，柳本尊直承金剛一系即是證明。“成都縣口龍池坊……卞……印賣”的卞家造印本陀羅經咒，是現存這種印本的早期遺存之一。益州與張議潮統治時期的敦煌，同樣是聯系密切的地點。發達的四川(蜀版)雕版印刷品遠輸敦煌。如中和二年(882年)《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曆》，天復二年(902年)過家之四川過家本《金剛經》，均發現于藏經洞中。川僧著作也多見于藏經洞，如四川靜真禪院廣政十年(947年)書寫的《維摩詰經講經文》，尾題《成都府大聖慈寺沙門藏川述》、附彩繪插圖的《佛說十王經》等。

在石窟造像題材方面，同樣也能反映晚唐、五代時四川與和長安、瓜州間緊密聯系。

如上所述統計表所示，與初、盛唐時期相比，晚唐、五代時期的四川密教造像題材，新增加的有毗沙門天王，藥師經變、華嚴三聖、白衣觀音、解冤結菩薩、不空絹索觀世音、不動明王、大威德金輪熾盛光佛、毗盧佛與十二緣覺、陀羅尼經幢、尊勝幢等(圖24.4)。

毗沙門天王像流行四川，晚唐後益多，其形像多作戴冠，著甲、手托寶塔，足踏夜叉，皆為主像供養，單獨鑿出。多大像，通江趙橋岩毗沙門天王像高4.7米。不空譯《北方毗沙門天王隨君護法儀軌》中，有“晝夜守護國王大臣及百官僚相與殺害打陵”句，並記述天寶元年(742年)大石、康等五國圍守安西(今新疆庫車)，因請不空法師作法，用毗沙門神兵救援。後神兵擊敗敵兵，北門樓見毗沙門天王像，故宣付十道節度置像供養事。此外，開元、

天寶間，唐玄宗曾敕命車政去於闐寫天王真容，安西進摹寫天王像。唐資州刺史羊士諤作《毗沙門天王贊》，故資中石窟多天王像。資中西岩 34窟原雕毗沙門天王像供養，現像佚而碑存。碑立於天成四年(929年)，由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同空兼禦史大夫，上柱國李，資州刺史程國元等官吏、眷屬及“前八縣都押寺僧行越”等聯名具署。碑文記述天寶初西口“犬羊之衆萬隊”作亂，天王顯聖平息，鹹通中“南蠻叛亂，圍逼成都，聚十萬衆，”造成“府之城池將陷”的危勢，幸賴天王“遽顯神威”而擊潰。這不僅是研究晚唐時蜀與境外吐魯、南詔關係史的重要史料，也是四川多關天王像的重要原因。

在晚唐以後密宗在四川迅速傳播的情形下，原本一些顯教題材也會受到密宗的影響，為密宗教所用。如華嚴三聖、藥師，地藏這些題材，盧舍那佛與文殊菩薩，普賢菩薩，此時亦多涉密教。《宋史》卷5《唐代州五台山清涼寺澄觀傳》記，大曆十一年(776年)，澄觀“誓遊五台，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賢林請講大經，並演諸論。況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為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即是華嚴之義也”。因此，遂有華嚴三聖像的流行。大足北山 279窟，雕造藥師變，十方佛，陀羅尼幢及地藏像，銘為“十方佛，阿彌陀佛，尊勝幢，地藏菩薩四身共一龕”，281窟雕造藥師變，七佛，三世佛，陀羅尼經幢及地藏菩薩，銘為“敬鑄造藥師琉璃光佛、菩薩十二神王部衆並七佛，三世佛，阿彌陀佛，尊勝幢一所並地藏菩薩一身，都共一龕”。

東方藥師琉璃光佛，亦為四川密教造像常見的題材。隋達磨笈多譯《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中記述，東方淨琉璃世界，有佛名藥師琉璃光如來，當他作菩薩時，曾

發十二大願，解救衆生。成佛後，凡敬藥師佛者，可免除九橫死的惡果。四川較早的藥師題材以藥師三尊的形式出現于盛唐，大足北山 279、281 龕，雕出藥師佛，日光、月光菩薩，並十二神王衆，可說是簡單的藥師變組合。安嶽千佛寨 76 窟雕於五代，藥師佛坐束腰圓蓮座，身側二樹，頭上懸華蓋，左右立八大菩薩，左右壁面浮雕九橫死與十二大願，刻有榜題，龕下爲十二神將。這是國內僅存的較完備的藥師經變石雕作品，與敦煌同類題材壁畫十分接近。

沙門形地藏與十王題材，是四川密教造像的顯著特點，五代以後，地藏形像多作頭披風帽，雙手分持寶珠、錫杖的形式。成都府大聖慈寺沙門藏川述寫的《佛說十王經》廣爲流傳，於是解救衆生出地獄的地藏菩薩造像與地獄十王、六道輪回，地獄變等題材聯系起來。資中西崖 85 龕正面浮雕地藏像，兩側雕五身像，銘爲：“因設報恩齋慶贊畢，齋頭弟子劉口口鑄造上件功德。時光化口年(898—901年)忠勝鄉下口口雲澄等參拾人，就當院設修十王並報恩齋”，這是現知最早標明地藏十王及報恩齋的一龕。大足北山 58 窟雕像造阿彌陀，觀音，地藏像，銘口：“敬造地藏菩薩，右衙第三軍散師鍾審能，爲三男希吉被賦傷，敬造上件功德，早生西方，見聞佛法，以永平五年(915年)四月四日，因修七齋表贊訖，永爲供養”。按《十王經》主要內容爲“作七齋”，“供十王”之類。造像主爲子受傷修七齋，與西崖齋頭弟子“修設十王並報恩齋”同爲一義。供養地藏像，可爲修七齋，設十王之用。安嶽圓覺洞五代雕造 84 窟則雕造地藏十王與六趣輪回圖。內江翔龍山造像，也有地藏十王與地獄變圖。其依據，可能爲藏川“佛說地藏菩薩發心因緣經”中所說：“悲願

金剛地藏菩薩，或入地獄，皆令離苦及餘惡趣，遍入救生，願力自在，月月不怠”。晚唐以後，地藏十王題材傳入各地。杭州慈雲嶺五代天福七年(942年)西方三聖龕龕，有地藏與六趣輪回圖。敦煌舊藏有藏川十王經。《圖畫見聞志》載五代初“王喬士畫佛道人物，尤愛畫地藏菩薩及十王像，凡有百餘本傳於世。”可見其影響。

宋代四川密教遺迹

宋代四川密教造像題材，表列如下
四川宋代密教造像統計表

時代	內容
宋代	地藏、觀音與十王(大足北山 253窟，咸平四年，1001年) 地藏、寶志，道明和尚(北山 177窟，靖康三年，1126年) 地藏十王地獄變與六趣輪回(大足寶頂山大佛灣) 寶志和尚(大足石篆山 2窟，元豐八年，1185年) 孔雀明王(大足北山 115窟，靖康三年，寶頂山大佛灣，石門山 8窟) 訶利帝母(大足北山 122窟，石門山 9窟) 如意輪觀世音菩薩(大足北山 149窟，建炎二年，1128年) 寶珠菩薩(大足北山 132窟) 數珠手觀世音菩薩(大足北山 125窟) 玉印菩薩(大足北山 118窟) 不空絹索觀世音菩薩(大足北山 119、127、148窟) 准提菩薩(安嶽華嚴洞) 解冤結菩薩(安嶽千佛寨 60窟，慶元元年，1196年)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足寶頂大佛灣) 毗盧佛(大足北 105窟，安嶽毗盧洞，華嚴洞) 毗盧佛與十二圓覺菩薩(安嶽圓覺洞，慶曆四年，1044年：安嶽華嚴洞，大足北山 180窟。大足寶頂大佛灣) 毗沙門天五(資中西岩 29窟，開寶九年，976年) 摩利支天女(大足北山 130窟，安嶽華嚴洞) 西方三聖及十聖觀音菩薩(淨瓶，寶藍手、寶扇手楊柳、寶珠手、寶鏡手，蓮花手，如意輪，數珠手，大足石門山 6窟，紹興十年，1140年) 釋迦與六菩薩(文殊，玉印，如意輪，普賢，日月，數珠手。大足北山 136窟，紹興十二-----十五年，1142---1146年) 大威德金輪熾盛光佛(大足北山 169窟) 藥師變(大足北山 110、147窟，石門山 1窟，紹興二十二

年， 1151年)
十大明王(大足寶頂山大佛灣、小佛灣)
廣大寶樓閣(大足寶頂大、小佛灣)
華嚴三聖(大足寶頂大、小佛灣)
十爍圖(大足寶頂山大佛灣，小佛灣，安嶽毗盧圖)

正如四川宋代蜀版大藏經的開雕，標志著我國第一部官刻大藏經的誕生一樣，以大足，安嶽為代表的四川宋代石窟群，其技藝之精湛，內容之豐富，規模之宏偉，為國內其它石窟所難以望其項背，出現了四川石窟雕造史上的又一盛期。其代表人物是趙智鳳。

趙智鳳(1159-1249年)，大足縣米糧裏沙溪人。年甫十六，西遊蜀都，於漢州(今新都)彌牟“聖壽本尊院”學柳本尊密法三載，自稱“六代組師傳密印”，承持其教，成為又一代阿闍梨。柳、趙相隔二百餘年，趙智鳳于南宋淳熙、淳祐年間(1174-1152年)，在大足寶頂山重振教風，歷七十餘年，獨立營造了一座大型石窟道場，以紀念兩代祖師的功業。柳本尊首創的四川川密教派，以自律清苦，自殘形骸，舍己為群為主，而趙智鳳生當宋世，遂審時度勢，大膽改革瑜伽舊規“發宏誓願，普施法水，禦災捍患，德恰遠近，莫不皈依”。使寶頂成為密教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寶頂山造像，“凡經典所載無不備列，”“幾乎將一代大教搜羅畢盡”。其題材內容除主要為密教造像外，還雕刻了表現孝養思想的《父母恩重經變》、《大方便佛報恩經變》，表現淨土題材的《觀無量壽經變》，表現禪宗思想的《楊次公證道牧牛圖》以及佛傳故事等顯密兼修，援儒入佛的造像，呈現了濃鬱的地方特點和時代特征。這是因為，宋代禪宗、理學盛行，三教合一之勢方興未艾。趙智鳳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和富有創造精神的宗教改革者，為振興已入頹勢的南宋密教，敢於順應時

勢，隨緣化度，正是他取得成功之所在，也是此時此地川密發展的大勢所趨。

安嶽臥佛院唐開元年間雕造的石刻佛經窟中，現存《大唐東京大敬愛寺》釋泰所撰的《一切經論目序》全文，表示唐代四川石窟造像重要來源之一仍然是北方的東西二京。那麼，宋代的情形如何？現存大足寶頂小佛灣的《經目塔》應是趙智鳳所建道場中“法寶”之所依。經目塔上所刻“佛說十二部大藏經”的佛經目錄，主要依據撰於開元十八年(730年)的《開元釋教錄入藏錄》而刊刻，只有《金剛頂瑜伽》、《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等一部分密典，可能為趙智鳳所編纂。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四川宋代石窟仍與中原北方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四川宋代新出的密教像，有地藏、十煉圖，十大明王，孔雀明王，寶珠菩薩，玉印菩薩，十聖觀音菩薩，摩利支天女，廣大寶樓閣等。其中，十聖觀音，數珠手觀音，十大明王，十煉圖，摩利支天女，大寶樓閣等，多未見於中原北方(包括敦煌)石窟。

孔雀明王造像，見於敦煌唐代壁畫，主要依據不空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雕鑿。此種題材在四川宋代始出。

大足寶頂山大佛灣石刻，薈萃了地藏，十王，地獄變與六趣輪回圖，是地藏系統最成熟的代表作。

大足寶頂山石刻，據稱先有小佛灣後有大佛灣，小佛灣石刻是大佛灣石刻的雛形與藍本。十煉圖與十大明王圖同見於大、小佛灣石刻，可見其之重要性。十煉圖在大足安嶽凡三處，包括煉指，立雪、煉踝，剜眼，割耳、煉心、煉頂、舍臂、煉陰等十項內容，十煉圖側各有榜

題，記述了柳本尊傳教事迹，並附刻金剛部五佛造像。十煉圖是四川宋代造像獨有的題材，亦是川密造像的主要特征之一。明王是大日如來教令衆菩薩現念怒身，降伏諸惡魔時的形像，是密教特有的造像，大足寶頂山的十大明王像，是國內唯一的遺存，只有雲南劍川石鍾山石窟的八大明王像可與之匹短敵。明王像多念怒相，也有非念妃相的明王，如大足的一面四臂騎孔雀的孔雀明王就是毗盧佛的等流正法輪身。成都大聖慈壽即曾有八大明王像。

四川宋代密教造像的另一顯著特點，是出現了品類繁雜的各種觀音造像，如十聖觀音，六大菩薩、數珠手觀音，准提觀音等，阿彌陀佛、觀音等像，也多與密教造像同窟造出。觀音造像的密教化，這與雲南密教造像有相近之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水陸齋會》造像的盛行，與密教的興起有一定的關係。按水陸法會的創始，據傳是梁武帝夢中得神僧啓示，後受寶志禪師指教，乃撰《法界聖凡水陸普度大齋勝會》儀文。四川多寶志像，恐與水陸有一定淵源。唐代，密教冥道無遮大齋與梁武帝的六道慈懺相結合，發展為水陸法會。到了宋代，東川楊鏗祖述梁武舊儀，兼采密教儀軌，撰成《水陸儀》三卷，至此水陸法會得以興盛。蘇軾《水陸法象贊序》中說：“水陸道揚隨世增廣，惟蜀人頗存古法，像設猶有典型。”這種像設典型的所在，正是地外東川的大足。宋志磐撰《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軌儀》中所述水陸造像，上堂造像除佛、菩薩、緣覺聲聞及祖師外，有“十大明王，金剛，天王”。而下堂造像中，也包括了地藏十王、地獄和五趣輪回像，饒有興味。

現將國內現存主要水陸遺迹表列如下：

時代	地點	形式
元 - 明	山西稽山青龍寺	壁畫
明	山西右玉寶寧寺	掛軸畫
明	山西繁峙公主寺	壁畫
明	山西平順金燈寺	浮雕
明	山西洪洞廣勝寺上寺	壁畫
明	山西高平開化寺	石刻
明	河北石家莊毗盧寺	壁畫
汪清	山西渾源永安寺	壁畫
清	陝西洛川博物館	掛軸畫
清	西安水陸庵	壁畫、塑畫
清 - 民國	山西大同破魯寺	壁畫
宋	四川大足北山石窟，石篆、妙高山石窟	

從表中可以看出，宋代四川石窟是國內水陸遺迹最早的遺存，這與水陸法會興起的始末是一致的。

說起水陸結會，不得不論及儒釋道三教造像的關係。眾所周知，國內石窟中最早的道教造像，出現於四川。隋唐以來，道教造像逐漸流行，佛道合流成爲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成都龍泉驛北周閔帝元年(557年)《強獨樂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牌》可爲其中的翹楚。安岳玄妙觀天寶七載(748年)許雕建的老君、真人，釋伽與老君並坐像七十五個窟龕，爲現存最精致佛道合龕像，安嶽圖覺洞五代雕造的39窟，是天尊釋伽與老君三鋪造像共存一窟。

儒、釋、道三教造像始見於四川北宋石窟中。這種三教合一造像，爲他處所少見。四川的三教造像有兩種情形，一是同鑿於一窟之中，大足妙高山南宋初紹興年間的第2窟，正壁雕釋伽，左壁雕老君，右壁雕孔子，佛橋12窟正中爲毗盧佛，左右爲道、儒像。一是同鑿一處窟群而分處窟室，如大足石篆山雕造元祐三年文宣王及十哲像，元祐五年文殊普賢像，元豐年老君像。石門山窟爲紹興21

年藥師佛，紹興十年玉皇大帝像。

三教合一造像的興盛，多與水陸法會密切相關，大足石篆山7窟，窟中雕三身佛，元祐三年(1088年)題記作“戊辰歲十月七日修水陸會慶贊訖”字句。據大足石篆山佛惠寺宋元祐五年(1090年)嚴遜撰《佛惠寺記》記載，石篆山崖刻像“凡十有四，曰毗盧釋迦彌勒佛龕(三身佛)，曰熾盛光佛十一活龕，曰觀音菩薩，曰文殊普賢菩薩龕，曰地藏王菩薩龕，曰太上老君龕，曰志公和尚龕，曰藥王孫真人龕、曰聖母龕，曰土地神龕，曰山王常住佛會塔記龕。”石篆山石窟亦雕出三身佛、文殊普賢、老君、文宣王、地藏十王、寶志和尚等。大足北山靖康元年(1126年)建177窟，正中雕披鳳帽地藏王，兩壁各雕寶志、道明、閔公和泗州大聖像。北山253窟，龕中刻地藏十王與觀音像，題記佐：“昌元、永川、大足縣事陳紹與口家黃氏，為淳化五年草亂之時，口獲著口平善，常值聖明，妝繪此龕功德畢。成平四年(1001年)二月八日修水陸齋表慶贊訖。”上述三教造像，雖然不是如後代嚴整、完備意義上的水陸遺迹，但至少表明，當年雕造伊始，即與水陸齋會結有不解之緣，殆無疑義。它還表明，儒釋道造像的共處融合以及水陸法會的盛行，正是宋代理學形成後，三教合一思想在石窟領域真實而生動的反映，也是川密影響日益擴大的結果。